



红叶文学丛书

网「外」放谈

网“外”放谈

陈丹晨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西宁

红叶文学丛书
网“外”放谈

陈丹晨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153,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460

统一书号：10097·456

定价：1.40元

《红叶文学丛书》前言

红叶，是秋的花藻；秋，是成熟、收获的季节。

《红叶文学丛书》呈献给读者的，希望是一簇簇较成熟作者的较成熟收获。

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是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光辉大旗，《红叶文学丛书》的作者和编者都是这面光辉大旗下的列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的有效方针，我们希望，《红叶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也能正确体现这种原则精神。

我们务求丛书的每一作品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宫的一砖、一瓦、一沙、一石。

我们确认的使命是，以健康、有益而各具独特艺术风格的读物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人民正

视现实，瞩目未来，振作勇于创造的精神，以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轨道前进。

《红叶文学丛书》荟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时也编入了有价值的外国文学译著。

限于水平，我们的工作中一定会出现各种不足和缺陷，诚恳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帮助。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得到的和失去的	(1)
文艺与泪水	(5)
表现思想解放的时代	(11)
烤鸭与创新	(17)
不平家的声音	(24)
更多关注同胞的命运	(28)
不要忘掉莎士比亚	(31)
还是有点“余味”的好	(34)
为官僚主义者画像	
——关于“渤海二号”事故琐想	(39)
拜物教及其他	(45)
打棍子和柴大官人	(50)
文人相轻与审己度人	(53)
“勘误致酬”及其他	(58)
“口将言而嗫嚅……”	(62)
“挑”	(66)
社会的厚爱和赐予	(69)
为了促进真切的文艺批评	(76)

要想评论自由，同志尚须努力！	(81)
文艺理论批评甘苦谈	(85)
且说艺术生命的短与长	(89)
反映社会变革是文学历来的主题	(94)
文艺要渗透现代变革的意识	(96)
中篇评奖之余	(110)
关于“创作方法”考释	(114)
漫谈人物外形描写	(122)
关于“杂文”	(128)
《雪泥鸿爪》后记	(132)
讲故事与民族化问题	(135)
挑战和导引	(142)
实事求是地看待所谓“通俗文艺”	(147)
《牧马人》观后琐想	(156)
一面真实的镜子	(161)
亲近的、生动的农村生活写照	(168)
关于《倾斜的阁楼》	(186)
新的创业史	
——谈《燕赵悲歌》	(190)
高加林的人生悲剧	
——影片《人生》观后	(197)
《花园街五号》观后	(204)

关于《寒夜》	
——从小说到电影	(210)
芦花，慢慢地飘	
——观电视剧《秋雪湖之恋》	(222)
关于《深入生活琐谈》的琐谈	
——学习毛泽东著作札记兼与蔡天心	
同志商榷	(226)
附：深入生活琐谈（蔡天心）	(237)
“十六年”无差别吗？	
——评《时代的报告》的“本刊说明” (244)
关于“复归”问题的通信	
对李何林同志文章的补充（安康）	(257)
我的简单说明（李何林）	(260)
文艺创作的试金石	(263)
小议文艺创作的“关卡”	(269)
关于发展文艺生产力的问题	(273)
改革文艺体制，刻不容缓	(276)
把创作自由鲜明地写在社会主义	
文艺旗帜上	(282)
评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利	(290)
后记	(293)

得到的和失去的

看完电影《保尔·柯察金》，心胸间似乎卷起一阵阵海涛，久久难以平静下来。我从书箱底找出那本久已不曾翻阅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到保尔和修路工作队员们为了保证供应火车和城市取暖需用的木材，为了使千万人能够度过一个温暖的严冬而舍身奋斗、修建铁路的那个章节，在灯下阅读起来；刚才那些激动人心的镜头重新又在眼前活跃、映现：

……滂沱的大雨，泥泞的工地，疲惫的劳动，熊熊腾跃的火焰，铿锵而带着悲壮音响的钟声正在庄严而有力地召唤着人们……然后又是匪徒们的骚扰，暴风雪的袭击，饥饿严寒的交迫，传染病的威胁……

保尔和他的战友们以惊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战胜了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献出了他们宝贵的青春，以至鲜血和生命。从他们一张张饱经苦难磨炼而瘦削了的、但却充满着乐观信心的刚毅的面容上，我们看到了闪烁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灿烂

光辉。

理想，对于每一个革命战士，是力量，是方向。在保尔短促而匆忙的一生中，他从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和青春，从不肯停息工作和战斗。当他双目失明、周身瘫痪时，仍然坚持学习，为自己寻找新的战斗岗位，并因为找到了文学写作这一武器而兴奋。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失去了青春和爱情，失去了健康和劳动力，这将是多么巨大而难以补偿的损失啊！然而保尔却真诚地认为：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失去的要多得多。为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而献身奋斗，这个崇高理想始终鼓舞并指引着保尔去处理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我的一日》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我深深地感到幸福。我个人的悲剧，已为创造和知识的奇迹的愉快所消灭了。因为我们的手放下了我们所建筑的美丽建筑物的砖石，这个建筑物的名字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是作品中的保尔的幸福观。

保尔，是无产阶级的骄傲。在我们革命历史中，也有过许许多多保尔式的战士和英雄，他们都是我们人民的骄傲。在烈火浓烟中，挺身高举炸药包的董存瑞；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到为人民服务

务中去的雷锋……。他们都是平凡而伟大的战士。他们的英名彪炳千秋，永垂青史；他们的精神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芒，象一团火点燃了亿万青年心中的火炬。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

这些动人的故事和崇高的精神早在一、二十年以前，有的甚至更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都是为我们前辈们所熟知的，而在今天似乎愈来愈为一些人淡忘了。

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林彪、“四人帮”一伙衣冠禽兽的横行和破坏，革命精神黯淡了。在“四人帮”的法西斯思想的毒害下，有一些人追逐私利，膨胀野心，踩着别人的身体爬上高位，终于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跌了下来。在“四人帮”的极端虚伪的“革命”理论欺骗下，还使一些青年丧失了信心和理想。有的人不愿从事艰苦的平凡的劳动，成了游手好闲、追求浮华淫佚的恶俗生活的社会寄生虫。冬尼娅式的酸臭、庸俗的市侩偏见也在泛滥起来。在冬尼娅看来，保尔早年参加革命，有了功劳，就应该当官发财，至少也应该弄个什么委员当当，过上优越享乐的生活。因此，当后来保尔仍然做着掘土修路的工作，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她

面前时，她不能不感到惶惑以至不可思议。如今，不也有人认为自己家庭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受过迫害，现在理应享受享受，放肆地利用职权捞好处吗？他们的言行象毒菌一样，损害着青年人的心灵。

但是，也在这些年，又出现了多少为祖国的复兴英勇奋斗的斗士，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表现了不畏强暴的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威武雄壮的活剧；也还有多少青年，终年在边疆、农村和厂矿，沐雨栉风，默默地劳动；又还有多少青年苦战在科技、文化、教育战线，呕心沥血，埋首工作。他们都是热爱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无名英雄，象当年的保尔和他的战友们一样，用青春和生命，用一锹一锤的劳动，用涓涓滴滴的知识，在为千千万万人民的美好生活中，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辉煌未来填筑坚实的基础。他们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他们中间，革命的传统、新的道德风尚正在继续发扬光大。

让我为这些贡献最多、得到最少、但又最不为人注意的青年朋友唱一支微弱的颂歌，愿我们牢牢记住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最后一句伟大的名言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一九七八年二月

文艺与泪水

《牛虻》是一部为青少年喜爱的读物。《牛虻》的重版，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有同志在充分肯定这本好书的同时，还指出了它的主要缺点在于有关蒙泰尼里与亚瑟之间的父子之爱和亚瑟与琼玛之间的男女之爱的描写，认为这是“人性论”，需要加以慎重鉴别。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当然是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但这个意见本身却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在《牛虻》中，蒙泰尼里表面上是个德高望重、虔诚圣洁的神甫，无论教会政界，还是善男信女都把他当作圣人，对他十分崇拜和尊敬；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极为虚伪卑劣、残忍狡诈的家伙。他爱亚瑟，爱得那么深。因为他是一个不准享受普通人婚姻生活权利的教士，而亚瑟是他与一个有夫之妇的私生子，他爱亚瑟是很自然的。亚瑟自小在一个不愉快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蒙泰尼里“亲父”一般的照料、爱护和指导，因此，他爱蒙泰尼里也是很自然的。即使到了后来，

他也不能完全忘怀。关键在于蒙泰尼里和亚瑟终究是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完全对立的道路的人。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彼此都有过互相争取的想法，但终究谁也不能影响谁。蒙泰尼里几次表示可以为亚瑟丢掉一切，但在上帝与亲子之间，他决不丢掉他的“上帝”，以至两次亲手杀死自己的亲子亚瑟。作者写他的爱愈深，也愈突出地写了他的反动阶级的虚伪和残忍。亚瑟对蒙泰尼里的丑恶本质的揭露、批判和憎恨那就更多更尖锐了。因此，《牛虻》确实写了人性，写了父子之爱，写了男女之爱，但又都是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各人的身份、政治观点等所制约的。我们怎么能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把这些描写归诸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呢？

这使我想起，这些年来“四人帮”鼓吹的一种谬论，即文艺作品不管写了什么样的人性，也不管怎么写的，统统都是“人性论”，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能讲阶级斗争，不准讲感情；只有阶级性，不能有人性，因此都是冷酷的、摒绝人间一切情感的抽象的人。人性、感情倒成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有的东西。“四人帮”把阶级性和人性说成是完全对立的、而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人性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同起来。这真是“左”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在这种假左真右的

谬论的影响下，很多文艺作品中的人物都象一个模子里复制出来的“傀儡”，只会满口政治术语，声嘶力竭地空洞叫喊；人与人之间，不管什么关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无休止的政治概念的演绎。例如，亲人就义是不许哭的，男女之爱都要剔除干净，以至亲生母亲被敌人烧死了，面对着大火，小小的孩子竟然还能冷静地要求群众撤退，并只是略带悲切地说，妈妈说过，不能让群众吃亏。诸如此类的描写，又怎么可能打动观众、读者，人物形象又怎么可能给人以真实生动的感受。就象恩格斯曾经严厉地批评过的那样：“这个人不是由娘胎里生出来的：他象由蛹变成蝴蝶一样，是从一神教的神身上飞出来的。所以，这个人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展了的及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跟其他的人也来往，但是其中每一个人也和他本人一样都是抽象的。”正因为这样，一旦某些作品出现了一些细腻的感情描写，有人就会惊慌起来：“来了！‘人性论’又出来了！”

人性，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当然不可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问题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在阶级社会里，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但是，不同的阶级之间也有共同的人性，这样才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到了社

社会主义社会，人性理应得到丰富发展。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将是一个最合乎人性、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社会。因此，早在一九六一年，周总理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就曾批评了某些文艺作品不敢放手描写无产阶级人性，批评了有些人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指出：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

既然文艺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社会的人，阶级的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之中、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那么，就应该通过人与人之间、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自然、社会中的活动的描写，反映出人物的真实的、具体的思想感情及其个性特点。“阶级性也都是寓于这个具体人的具体生活、行动、思想感情之中体现出来。不承认阶级性，认为凡是人性都是超阶级的当然是不对的；否认人性，抹杀个性，这样的阶级性也是不存在的。从来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注意深刻描写人物的特定的具体的思想感情的。《红楼梦》里，贾政痛打贾宝玉是为了要他光宗耀祖，但也在众人连哭带劝之下，难受起来，“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自悔不该下毒

手打到如此地步”。这是一种父子之情。如果只是一味写贾政的毒打，那就真如赖嬷嬷所说的象“审贼”而不是打儿子了。因为审贼决不会落泪。《母亲》里，巴威尔决定在“五一”示威游行中，他要亲自打着红旗走在队伍的前面。因此，逮捕、坐牢、流放的必然命运等待着他。这使尼洛夫娜感到沉重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情绪攫住了心。她完全支持儿子这个崇高的革命行动，但却抑制不住自己这种怜爱的心情而为之颤栗、流泪。这是一位母亲的伟大的慈爱，难道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吗？同样的泪水，都是亲子之爱，尼洛夫娜的，与贾政的、蒙泰尼里的有区别的。尼洛夫娜的泪水是崇高的、纯洁的，人们同情、尊敬；贾政、蒙泰尼里的亲子之爱是丑恶的、卑污的，人们憎恶、鄙视。可见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人性、人情，而在于正确地深刻描写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的同时，要揭示出它的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特征。

“四人帮”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抹杀人性，把人性当成一种邪恶的、修正主义的同义词。这是因为“四人帮”本身就是一伙“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他们干的那些法西斯暴行决不是一般正常的人所能干出来的。因此，他们把人性视若大敌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他们强加在文艺创作中的